

■ 学术评论与争鸣

# 《孔子诗论》真伪疑议

魏耕原

(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, 710065;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119)

**摘要:**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(一)自 2001 年出版后,特别是其中的《孔子诗论》引起轰动而持久的考释、研究热潮,论文与专著交相纷然出现,成为一时之显学,延续数年之久。然此竹书有不少疑窦,颇值得重新思考。它与《论语》在论《诗经》上有许多不合,如思想、语言、词汇、文字、句式等都有极大差异;荀子最看重子曰《诗》云,他又是鲁、韩、毛《诗》的传授者,也是早期儒家最后的大师,而且晚年定居楚国,然而作于晚期的《荀子》看不到的《孔子诗论》的痕迹;秦火之后,西汉广收先秦典籍,然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与两汉经学著作,以及史学、哲学著述等,均未见提及过,更谈不上引用;再从历代出土的简帛书看,从来没有发现过著名的儒家失传著作,如《乐经》,或孔子的任何其他著作;以往伪书最看重对儒家经典的冒名制作,如东晋出现的伪《古文尚书》,明代冒出的《申培诗说》,都和社会风气、时代时潮相关,目的不外乎名或者利。《孔子诗论》没有出土地点,又出现在社会作伪风气日涨之时,就更值得深思慎别。本此以上五点,以别伪求真的眼光对此予以重新思考。

**关键词:**《孔子诗论》;《论语》;《荀子》;两汉人著述

**中图分类号:** I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672-4283(2014)01-0080-08

**收稿日期:** 2013-03-13

**作者简介:** 魏耕原,男,陕西周至人,西安文理学院特聘教授,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博士研究生导师。

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整理与出版,在文博考古范围,以至于文史哲等领域,引起强烈震撼,许多学者持以健旺的热情投入研究。尤其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册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以后,牵动圈内外更多学者的兴趣,引发更多的学人注意与研究。随之而来的论文像雨后春笋,遍布大小刊物;三、四年之间不少专著纷披出版,络绎问世。热潮澎湃到 3 年后,直至 2004 年尚方兴未艾。截至今日,仍然有文章发表。十几年来,绝大部分论文都集中在《孔子诗论》(以下简称《诗论》)上。很显然,《诗论》成为讨论的热点与焦点。一是《诗经》为六经之一,属于最古老的儒学与文学经典,向来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;二是由孔子来阐释《诗经》,孔子在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。所以《诗论》自然成为重中之重,也是引起研究者兴奋的最耀眼的亮点。10 年来,我们反复思考着这一亮点,发现不少疑点,为什么突然冒出如此这样一部要典,为什么它和文献史、思想史、经

学史等是那样的格格不入?有时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说服自己,希望她是一部真典,能够战胜贮存的疑问。然而“真伪常交战,道胜无威颜”,在求真方面战胜不了自己,就像岩浆一样不停地翻滚。反复思考,本着学人的良知,先把疑问提出来,以期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与讨论,求得问题的解决。然又有万分疑虑与困惑,是不是会引起什么时忌,是不是会损伤什么,是不是会引发许多如我们一样的学人的不悦,甚至震怒,是不是会给自己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,甚至牵连到所在单位。就此多年来反复思考,也反复请教了身边各有所长的师友们,得到的只是一种鼓励,一种纯学术意识的支持。反过来,我们倒反复担心是不是会有什么负面不幸降临。既然大家说这是一种学术讨论,我们的想法原本即由此滋发的。所以本着平常心待平常事,学人面对学术的问题,把我们心中久积的疑惑提出来,希望高明能答疑解惑,能揭示问题的真相,此即本文之渴望与宿愿。

## 一、《诗论》与《论语》为何不合？

人所共知,《论语》记述了孔子一生的重要言论与主要经历,是孔子的及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所载述的关于孔子言行的回忆录。全书20篇共492章中,记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之语者,共444章,记孔门弟子相与言者,仅48章<sup>①</sup>。所以,要了解孔子,《论语》的材料最为丰富,也最为可靠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《孔子世家》就是主要依据《论语》,排比材料,为孔子立一大传,并写了《仲尼弟子列传》。在《论语》里,在孔子与弟子讨论《六经》中,涉及《诗》的为数最多,凡12篇,共19则。从这些讨论中,不可能不会看到与今日所说的《诗论》之关系,究竟怎样。这19则言《诗》者可分四类:《诗》之作用,《诗》之论述,举《诗》以为证,以及与《诗》相关者。

先看其一,孔子关于《诗》的作用:

1. 诵《诗三百》,授之以政,不达;使用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 (《子路》)
2. 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 (《季氏》)
3. 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 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 (《阳货》)
4. 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? (《阳货》)
5. 兴于《诗》,立于礼,成于乐。 (《泰伯》)

以上5则,在孔子看来,《诗》是从政的教科书,是立身处世的百科全书,可以“事父”、“事君”,可以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,即联想力、观察力、合群的凝聚力,以及表达怨讽的能力,都可以得到提高,并且可以使人振奋,可为修身之先,还可以获得自然博物的知识。如果学了《诗》从政而不通,处事不能独立应对,那就等于没学。所以,不学《诗》,就不会和别人交流,就像面墙而立,什么也看不见,如睁眼瞎子一样。由此可见,孔子非常看重《诗》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,以及在礼制社会的种种功能,乃至家中之“事父”,自然中之识物。这些都是孔子与春秋时代的《诗》的实际功用。然而,《孔子诗论》则强调的是“《诗》亡隐志”(第一简),即“《诗》言志”义。《论语》不是专门论诗的,而《诗论》则是专论《诗》,然就《诗》之用来说,与《论语》所论《诗》的实用价值相比,不仅取向不同,而且有丰富与简陋之区别。

其二,看孔子对《诗经》之论述:

1. 《诗三百》,一言以蔽之,曰“思无邪”。 (《为政》)
2. 《关雎》,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。 (《八佾》)
3. 师挚之始,《关雎》之乱,洋洋乎盈耳哉! (《泰伯》)
4. 颜渊问为邦,子曰:“……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。” (《卫灵公》)

5. 恶紫之夺朱,恶郑声之乱雅乐,恶利口之覆邦家。 (《阳货》)

早期的《诗》是和音乐分不开的,故孔子论《诗》涉及歌词与乐曲两方面。以上五则,前两条论《诗》之词,后三条言《诗》之乐。孔子对《诗》并非全面肯定,而是有所臧否。认为《诗》之内容是“思无邪”<sup>②</sup>,即思想是纯正的,这是借《诗》论《诗》,原来无义的句首虚词“思”,孔子引用时却当作思想解,本是春秋以降的断章取义的通行作法,借来评论《诗》的所有诗篇,这是就《诗经》的整体大致情况所言,同样也反映了所处时代用《诗》的特征。孔子特别看重《诗》的首篇《关雎》,认为它的内容:快乐而不放荡,悲哀而不痛苦,显示了对表达感情的乐与哀都不过分的中和审美观。又认为《关雎》的音乐无论是序曲还是尾曲,让人满耳都充满了美好的乐声。由此可见对《关雎》的特别推崇,也可以联想到在谈《诗》之用时,对《周南》与《召南》的看重。以上三条是孔子论《诗》的重点,谈的正面。正如《荀子·劝学》所说的“《诗》者,中声之所止也”,正是对孔子论《诗》的继承。至于负面,则谓《郑风》的乐曲为淫秽的靡靡之音,要像斥退小人一样,必须疏远郑声,因为郑声破坏了典雅的乐曲,就像能牙利嘴可以颠覆国家一样。前人言此,总是把“郑声”与《郑风》的歌词分开,认为二者不同。其实乐词与所配的乐曲是一致的,不能说雅正的歌词配上了淫乱的音乐。因为不这样解释,在他们看来,这就和孔子对《诗》的总评“思无邪”有了矛盾。其实“思无邪”是就总体倾向而言,“郑声”郑词之淫的批评属于局部个别的,二者所谈的侧重不同,并不存在矛盾,亦无须回护孔子对《郑风》的看法。

其三,则是言事举《诗》以为证。所引《诗》见于《学而》《八佾》《泰伯》《宪问》4篇,涉及《诗》之《卫风》中的《硕人》与《淇奥》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《小雅·小旻》《周颂·雍》等4篇,以及《子罕》所证举之逸诗。其中两次为子贡引诗,余皆为孔子所引。此与论《诗》无涉,可不详举。

其四,是与《诗》相关者。《子罕》:“吾自卫反于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《述而》: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,皆雅言也。”

由以上三、四两类,可以看出孔子对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全面重视。

综上所述,首先,可看出《论语》中孔子论《诗》

<sup>①</sup> 参见赵纪彬《论语新探》,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,第1页。《论语》各本分章略有不同,但相互出入不甚太大。

<sup>②</sup> “思无邪”一语,原本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駉》,赞美善于拉车的马。称美说是“思无邪,思马斯徂”,陈奂释首章“思无疆,思马斯臧”时说“思,词也。斯犹其也。”那么“思无邪”两句是说“啊,马拉车儿不歪斜,啊,马拉车儿就像飞呀!”

与《孔子诗论》不相合者有以下几点:一是《论语》中论及《诗》之用,孔子主要反复强调它从政、“专对”、事父、事君、兴观群怨的作用,以及多识鸟兽草木之名,均为实用价值,而非“《诗》无隐志”的情志观。显示出实用观与情志观的差异,存在客观与主观取向上的不同。二是前者看重《诗》的纯正与《关雎》审美的综合性,而后者认为“《关雎》之改,……以色喻于礼”(第十简);“其四章则喻矣:以琴瑟之悦,凝好色之愿;以钟鼓之乐”(第十四简),用以礼节情的观念论《关雎》,认为男主人公由“好色”改到礼上,强调从“好色”到礼义的转变,所谓琴瑟之悦礼,净化了好色的情欲。前者以为表达的乐与哀的男女之情,并没有什么“礼”的参予,二者的泾渭之别,灼然可晓。三是《诗论》言《诗》凡77篇次,除去重复的17篇与一首逸诗,尚余59首,《国风》未涉及的只有《魏风》《秦风》《豳风》。其中言及《郑风》的只有两简,第十七简说“《将仲》之言,不可不畏也。”第二十九简“《涉溱》其绝,律而士。”次句不好解。前句的“涉溱”,因《郑风·褰裳》有“褰裳涉溱”,编者马承源以为即指《褰裳》。均与《论语》所说的“郑声淫”、“郑声之乱雅乐”的意思迥别。虽然一言“声”一言内容,然如前所言《诗》之乐与词休戚相关,而不是《郑风》之声“淫”,而其词则纯正。所以《论语》在论“郑声”与《诗论》所论《郑风》此两篇,则存乎明显的不可回避的抵触与矛盾。四是从语法看,二者造句有明显不同。《论语》只有一处用一单音词解释《诗》之乐,即“郑声淫”,“淫”属形容词,在意义的内涵与外延上都不会有其他意义的孳生。而《诗论》却出现大量的以一单音动词释《诗》<sup>①</sup>:

1.《关雎》之改,《樛木》之时,《汉广》之知,《鹊巢》之归,《甘棠》之保,《绿衣》之思,《燕燕》之情,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。(第十简)

2.《绿衣》之忧,思古人也。《燕燕》之情,以其独也。(第十六简)

3.因《木瓜》之报,以喻其悃者也。(第十八简)

4.《将大车》之罍也,则以为不可如何也。《湛露》之益也,其犹驰与?(第二十一简)

5.《涉溱》其绝,律而士。(第二十九简)

以上5简,凡涉及《诗》之11首,其中的“改”、“归”、“保”、“报”、“绝”,均为动词,其本身义域较形容词宽泛得多,故后缀以短句,再予以解释。如本文开篇即言《论语》是对孔子言论的追忆,而《诗论》的编者亦谓对孔子言论的记录,均属口头语言,又都是针对《诗》而言,为什么二者的差距如此悬隔!其次《论语》中孔子的语气舒缓含蓄,温润而富有变化,亲切而富有文采。正如颜回所说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”,使人“欲罢不能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只有在感情激烈时,或热烈或感慨或愤慨时,才会出现短

促的句子,如前所引“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”,无论句首或句尾全不用虚词,语气斩截犀利,句式简捷劲锐。然孔子口语的主要风格是温和的、舒缓的,如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“洋洋乎盈耳哉”或者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……,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……”,多带有虚词,句意凝练,或者有波折、有感叹,有反复回环的节奏,或者因排比与对偶而有优游不迫的旋律。而《诗论》的语言,急促简捷,像一种简短的判词,而且用的口语词汇,却不是口头句式。口语的判断句,没有如此短促。而且它的词汇是贫乏的,不仅体现在实词上,而且连虚词都是那样的单调,且在句末僵硬的用了清一色的“也”。由于用在短句之后,完全是为了充塞促成句子的完整,绝然缺乏口语表达的语气,特别是缺乏情感,与《论语》的语气绝然不类!同是一个夫子给弟子讲话,讲的又都是一部《诗》经,又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呢?用单字和一个短语结合起来解释一首诗,为什么在《论语》,以及先秦两汉的文献所记孔子语中没有如此之多的存在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

其次,《论语》里,孔子对“郑声”提出尖锐的批评,而在专论性质的《诗论》里,却没有任何一点消息。相反的是,所提到的《郑风》两首,一是“《将仲》之言,不可不畏也”(第十七简),一是“《涉溱》其绝,律而士”(第二十九简),不是不激不厉,就是语意不明而难晓其意,这和《论语》对“郑声”尖锐批评的态度差距又有多大呀!特别是那个生僻而刺眼的“律”字,如果这是抄手随意用的通假字,那么我们看看它的书法,是那样的雅美凝练,敲侧生姿,岂止是一般俗手所为,而信手出现如别字来。而在已出土的战国文字中,此字亦未有过露脸。并且在先秦文献没有出现,在僻字麇集的汉赋里没有,《方言》《说文解字》《尔雅》也无此字,它可能是个后起字<sup>②</sup>。即就是书面用词亦难认难懂,怎么会出现在先秦口语里。这“律而士”是什么意思,它和“其绝”又有语意上的什么联系,它又解释《涉溱》即《褰裳》的什么内容?这又怎能不让人大惑不解呢?而《诗论》编写者,恐怕亦非敦煌卷子抄录者那种粗识文墨之流,而在孔子弟子中,怎么会有此手笔呢!固然“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,比如后人的修改和增补、文字的改换、内容的摘抄或者篇章的单行等等”<sup>[1]311</sup>,然而这“律”,笔画分明,不存在异体、古今字的情况,也不存在偏旁移动,或者通假字情况。还有第十九简的“悃言”,似乎亦不见

① 本文所引《诗论》,全以陈桐生《孔子诗论研究》附录一《孔子诗论简注》(中华书局2004年版),陈本文字以马承源《释文考释》为底本,兼采他人释读,通假字直接读破,残缺处以省略号标出,有醒目之便。

② 宋人编的《集韵》说“律,律魅,大貌。”《北齐书·祖珽传》有“丽伯律”其人。

于先秦文献,而且后世亦为罕见;第三简的“悃怱”亦属此类,亦未见使用;还有第四简的“黑倦”,又是此种同类,不见经传,亦不见于文献。《诗论》复音词很少,而在不多的复音词中,却又有这些生僻的复音词汇,而且又出现在对口耳之学的记录中,这从语言词汇学看,无论如何,都难得以解释。

复次,《诗论》的观点,有明显与《论语》相抵触处,说明前者不可能出于孔子或其后学。如前所言,孔子对《关雎》的内容与音乐,都有很高的赞美。而《诗论》第十简则谓之“改”,故释者有由“好色”改到礼仪之上;又因第十简又有“以色喻于礼”,以及第十一简的“则其思益矣”,释者又释为《关雎》从“好色”改到礼仪之上,境界提高了,所以说诗人的思想进步了。还谓第十四简的“以琴瑟之悦,凝好色之愿;以钟鼓之乐,……”,是从“好色”到礼义的转折点。而此诗只是男子爱慕的内心表白,并没有“好色”而有非礼的想法,更无“从‘好色’改到礼仪之上”的心理经过,见不出任何“改”的理念意识。孔子所说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也只是说能善于把握自己的爱慕感情,也没有任何从非礼而“改”到礼仪上的含意。所以不管是此诗的内容还是孔子的阐释,都没有任何“改”的意思。

最后,《诗论》既是孔子论《诗》的专著,必然存乎与《论语》或其他先秦文献中孔子论《诗》相重合的部分,然从中却看不出来。如若以残简断编来解释,那么,为什么偏偏把重合的部分缺少了?又有论者说,仅于《说苑·贵德》与《孔子家语·好生》里略留遗迹。其实这两篇中前者《贵德》谓孔子言“吾于《甘棠》,见宗庙之敬也甚,尊其人必敬其位,顺安万物,古圣之道几哉!”后者《好生》则言“吾于《甘棠》,见宗庙之敬甚矣。思其人必爱其树;尊其人必敬其位;道也。”先秦两汉诸子所著,称述孔子之言,类多彼此互见,损益成文,甚至有问答之词,主名各别,此种情况,前人早有所言。而《诗论》第十简所言“《甘棠》之保,……盖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。”第十五简又言“《甘棠》之爱,以召公……”第二十四简还言“吾以《甘棠》得宗庙之敬,民性固然,甚贵其人,必敬其位;悦其人,必好其所为,恶其人者亦然。”因《甘棠》诗有言“蔽芾甘棠,勿剪勿伐,召伯所茇”,诗为怀念召伯而写则已明言之,而诗中并没有什么“终而贤于其初”的意思,显然与《诗》意及《说苑》《孔子家语》的孔子说法有别。而后一简的孔子所言,则又从上两书中略加损益而来,则又与第十简的“终贤于初”相互矛盾。由此,我们得出《诗论》第十简不仅与上二书矛盾,而且和自己第二十四简前后矛盾。从中我们看出的是错中出错的痕迹。

综上所述,《诗论》本身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纰漏与矛盾,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辨查,是真典,还是伪迹?

## 二、《荀子》何以不见《诗论》痕迹

我们知道,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。在先秦典籍里,除了《论语》,《荀子》最乐道子曰《诗》云<sup>①</sup>,其中举引现存《诗经》73次,引逸诗7次。引孔子语38次,其次引用《书》亦不少。引用“《传》曰”者15次。另外,还引用了曾子、子贡、子路等人语,还有“语曰”、“《小歌》曰”、“民语曰”等。可见《荀子》对征引文献非常重视,特别对《诗经》与孔子语尤为看重。且《荀子》为其晚年所著,他本人又是战国后期最大的博学者,作为最后一位儒学大师,他对儒学的研究带有集大成性质,包括对孟子性善论的驳正,以至于对法家理论的汲取。《孔子诗论》无论是孔子所作,还是孔子后学所作,其中大量出现孔子论《诗》的言论,涉及《诗经》的57篇。因释文差异,一说54篇。总之,在50篇以上。而且此为残简断编,若在其初,部头当然比我们现在看到的,不知要大多少。然而,对《诗》与孔子言论极为重视的《荀子》,又为什么没有引用《诗论》,而且看不到有关《诗论》的痕迹呢?

我们又知道孔子是述而不作的,他是研究型与实践型结合的大学者。他对《周礼》《易》、上古音乐,都有极浓厚的兴趣,甚至比《诗》更为陶醉。如果他能作出《孔子诗论》,或者对《诗》有如此多而系统的研究论述,而被弟子记载,那么为什么在《论语》里未见称述,相反却是龃龉不合,已如上言;如果有《孔子诗论》,那就更应当有《孔子礼论》《孔子易论》《孔子乐论》,然而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孔子一部什么著作。如果《孔子诗论》果真存乎战国,孟子必有所闻,然《孟子》同样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特别是像荀子这样的博学者,又对《诗经》与孔子及经学那样不厌其烦地征引,且对孔子的言论又是那样地尊崇,《孔子诗论》在他眼中,应当具有“双料价值”,而为什么连《荀子》同样也见不到任何痕迹?

《孔子诗论》据说属于战国楚简,如果果真如此,那么荀子晚年仕于楚,又终老于楚,且年寿很高。对于楚简《孔子诗论》,作为楚地最大的学者,他不会没有机会看到,若看到不可能在他的著述中不为之征引。从以上《荀子》征引文献的涉及之广,使我们有理由作此推论。特别是汉代的鲁、韩、毛三家《诗》,在战国传授过程中,都与荀子有举足轻重的

<sup>①</sup>《墨子》引诗10次,《孟子》13次,《荀子》则凡84次,涉及《诗》55首。说见蔡先全《孔子诗学研究》,齐鲁书社2006年版,第5页注<sup>①</sup>。据笔者手工检索,《荀子》引诗共80次,其中含自引逸诗6次,引曾子曰所引逸诗一次。另外评及《国风》《小雅》各一次。言及《清庙》之乐一次。论及《风》《小雅》《颂》各一次。

关系<sup>①</sup>。在传授《诗》的学统中,没有任何人在《诗》上可以与他相比,然而他对《孔子诗论》又为何视而不见,而没有出现在他的论述中。

关于古书传播,重要典籍向来记载有序。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,因用四言韵语写成,而两宋学术注重理性分析,故无人对此征引,尚引起当今学人对其真伪的怀疑。然《诗论》较《诗品》出现的时间,为《诗品》自问世至今时间约2.5倍;而且两书的作者及讨论内容,无论地位高低与内容之轻重,都不可同日而语。然《诗论》两千年来,未见任何书有所言及,又怎能使人不发生疑问呢?尤其是《荀子》一书不见称引,就足够引起我们对它的深思。而《荀子》里又有那么多的“孔子曰”、“《传》曰”,而不见《诗论》之语;又广引“曾子曰”、“子贡曰”、“子路曰”,以及“语曰”、“《小雅》曰”,却又不见《诗论》曰,这又是什么原因呢?其书之真乎,伪乎,是不是可以得出一点消息呢?

### 三、两汉文献为何不见《诗论》踪迹

秦火一炬,使许多先秦典籍付之灰烬,特别是《诗》成为首当其冲的毁灭对象。李斯提议“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《书》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《书》者弃市。”<sup>[2]255</sup>其建议得到雷厉风行的贯彻。然《诗》《书》并没有因遭如此重厄而在天壤间消失。到了汉惠帝,废除挟书律。文帝时,伏生把《尚书》从壁中取出,此时“《诗》始萌。天下众书往往颇出,皆诸子传说,犹广立于学宫,为置博士。……至孝武皇帝,然后邹、鲁、梁、赵颇有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先师”。<sup>[3]1969</sup>汉武帝时《诗》分齐、鲁、韩三家,齐人轅固生于景帝时立为博士,鲁则申培公于文帝时为博士,燕人韩婴亦于文帝时为博士。至景帝时,《五经》列于学官者,惟《诗》与《春秋》而已,余经未列。到武帝建元五年(前132),始置《五经》博士。公孙弘因治《春秋》,以白衣而为三公,封平津侯。博士官可置弟子50人,一岁辄试,能通一艺者,可补文学掌故缺。其高第可为郎中。此为汉武帝明经取士之盛典。诱之以利禄,成为儒学之通途。汉武帝还束帛加璧、以安车驷马迎申公,已属旷世仅见之盛事。汉武帝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,通一经者可以入仕,献一书者可以吃俸禄,儒学至此进入“昌明时代”。《诗经》特别见崇当时,而分为三家博士,红极一时。如此利禄坦途,怀一艺者莫不怦然心动。如果楚地某人拥有《孔子诗论》,当此《诗经》学与孔子儒学大盛之时,实为千载难逢之机,又怎能不会献上以求学官!而且属于最为权威的孔子诗论,比起齐、鲁、韩各呈一家之说,不啻高出多少倍。再说那位以《孔子诗论》殉葬者,处于战国之时,又没有后来秦始皇那样的严禁,自然会传给他的子孙或弟子,总不会因为殉葬而绝迹于天壤间。而在汉文帝、景帝、武帝儒路渐广以至宏阔之时,而又不献

出来,不受立于学官之诱导,岂不是咄咄怪事!

孔子弟子3000,高足72,而孔子既有诗论专著,传授者恐非一人。故《孔子诗论》当非一人所持有。至汉初文、景时,当会有人献出,然而此时亦然杳无踪影,这不是异常诧异之事?再说,从西晋汲冢书出土以降至今,从来没有见过孔子的论著出土,如果有其一,必有其二。而《孔子诗论》居然至今突现于人寰,这又说明了什么?

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《序》说“昔仲尼没而微言绝,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故《春秋》分为五,《诗》分为四,《易》有数家之传。战国从横,真伪分争,诸子之言,纷然淆乱。至秦患之,乃燔灭文章,以愚黔首。汉兴,改秦之败,大收篇籍,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,……于是建藏书之策,置写书之官,下及诸子传说,皆充秘府。成帝时,以书颇散亡,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”又命刘向、任宏、尹咸、李柱国校订群籍,编订诸书叙录为《别录》。向卒,子歆总群书而编成《七略》,班固的《汉志》就在此基础上编定而成。其中《诗经》与研究《诗经》的,除三家《诗经》外,尚有申公《鲁故》以及弟子的《鲁说》;轅固再传弟子后苍的《齐后氏故》,还有《齐孙氏故》《齐孙氏传》《齐杂记》;韩婴的《韩故》《韩内传》《韩外传》《韩说》;毛公的《毛诗》《毛诗故训传》。《汉志》说“凡诗六家”,即鲁、齐、韩、后氏、孙氏、毛氏。后氏与孙氏仍说《齐诗》,故实止四家,凡416卷。

由上可知,汉初至后期不仅广开献书之路,且派专人求天下之遗书,然后记录为一本总账,又由班固编成《艺文志》。在这150多年间,按求天下之书,不遗余力,为什么《孔子诗论》于此漫长时间,始终仍然没有露面?

《汉志》首列《六艺略》,凡分九类:易、书、诗、礼、乐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、小学,鸿篇巨制,单篇遗文,乃至小学字书,巨细不遗,长短大小靡不记载。如《孝经》一篇,凡18章,仅1872字,亦予以记录。至于研究《孝经》著作,如《长孙氏说》二篇,《汪氏说》

① 汪中《荀子通论》说“《经典释文·毛诗》引徐整云:‘子夏授高行子,高行子授薛仓子,薛仓子授帛妙子,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,毛公为《诗故训传》于家,以授赵人小毛公。一云:子夏传曾申,申传魏人李克,克传鲁人孟仲子,孟仲子传根牟子,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,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。’由此言之,《毛诗》,荀卿子之传也。《汉书·楚元王交传》: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同受《诗》于浮邱伯。伯者,孙卿门人也。《盐铁论》云:包邱子(即浮邱伯)与李斯俱事荀卿。刘向《叙录》云:浮邱伯受业为名儒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:申公,鲁人也,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受《诗》。……由是言之,《鲁诗》,荀卿子之传也。《韩诗》之存者,《外传》而已,其引荀卿子以说《诗》者四十有四。由是言之,《韩诗》,荀卿子之别子也。”此说虽不尽可据,然毛、鲁、韩诗为荀卿所传,亦非面壁凿空之言。

一篇,《翼氏说》一篇,《安昌侯说》一篇,虽各一二篇,亦一一予以著录。还有附在“孝经”类的《小尔雅》一篇,《古今字》一卷,《弟子职》一篇,无不一一记录。《孝经》据《班志》说,本为“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”,而得到流传与记录。然而,孔子为弟子讲论《诗》的《孔子诗论》又为何没有得到流传与记录?

另外,《诸子略》里的“儒家”类,记录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各自著述,如《子思》《曾子》《宓子》《景子》《世子》,均为孔子弟子所著,而《魏文侯》6篇,《李克》7篇,《公孙尼子》28篇等,均为孔子弟子之弟子所著,亦见载于《汉志》,而为什么他们的先生孔子本人的著作,或者说由孔子弟子直接记述孔子论《诗》的著作,又没有任何的消息,而不见载于《汉志》?这个道理恐怕也讲不通。《汉志》六略中最看重《六艺略》与《诸子略》,认为“诸子十家,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”,尽管“其言虽殊,辟犹水火,相灭亦相生也”,然“合其要归,亦《六经》之支与流裔,使其人遭明王圣主,得其所折中,皆股肱之材已”,然于此两类中均未见有《诗论》之著录,这就始终让人诧异而不能释怀!

在《汉志》关于先秦西汉人著述中,未有记录孔子一部著作。只是在《六艺略》的“易”类的末了总述中言及文王“重《易》六爻,作上下篇,孔氏为之《彖》《象》《系辞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之属十篇”。另外,相传鲁《春秋》曾经孔子整理,进入六经。而《汉志》之《六艺略》“春秋”类,首列《春秋古经》十二篇,并未言谁氏所作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说“《春秋古经》,虽《艺文志》有之,然夫子所修《春秋》,其本文世所不见。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,则俱自三《传》中取出经文,名之曰正经耳。”班固《汉志》又在“春秋”类末了总述中言“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,以失其真,故论本事而作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”同样的道理,在《六艺略》“易类”首列“《易经》十二篇,施、孟、梁丘三家”。颜师古注说:“上下经及十翼,故十二篇。”由此看来,“十翼”与《春秋》相传为孔子所作或重新整编,班固《汉志》均未列入正式的书目中,只是在“易类”与“春秋类”末了总述中有所提及,而实际上正式所录书目中,没有孔子一部著作。而且在整个书目及各类总述中,都没有《诗论》的任何踪影,这说明刘向、刘歆与班固都没有见过《诗论》。

从历史记载看,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都没有《诗论》的记载,《孟子》《荀子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孔子家语》。以及先秦汉其他诸子著作如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都没有同样的记载。到司马迁所作通史《史记》,对孔子怀着极为尊崇的心理,专作了《孔子世家》与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两篇大传,且使孔子进入“世家”的行列,其尊崇之意非常明显。然对于孔子的著述只记录了孔子序《书传》《礼记》,以及删《诗》与《易》之“十翼”。这些著述,都带有传说性

质。倘若《诗论》果真为孔子所作,或弟子所记孔子论《诗》,司马迁肯定要金笔大书在《孔子世家》里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今之《史记》未见任何影子,说明司马迁也没有看到这部经典,没有听到关于《孔子诗论》的任何传闻。否则,他肯定会兴高采烈地浓重大书一笔。

再则,在两汉人经学、子学类著作里也没有记载。如《毛诗故训传》与《毛诗传笺》,包括《毛诗序》在内,以及《韩诗外传》,未见引用。现存楚简《诗论》涉及《诗》的篇数,由于各家释文有异,故篇数多少有别,今据原编,凡59篇。另外还有7篇逸诗。我们今日见到的是残简断篇,想必讨论的篇数,当然不为此数所限。既然如此规模,而《毛传》《郑笺》《毛诗序》不见引录只言片语。还有三家诗,虽然失传,但宋、清两代学者稽录的佚文中,亦未见踪影。

两汉子书完整或残缺者不少,如陆贾《新语》,贾谊《新书》,刘安门客所共作的《淮南子》,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,以及扬雄的《太玄》《法言》等,亦均未见有任何记述与引用。至于东汉人的著作,以及东汉人注疏类著作,那就更不用提了。

总而言之,在先秦两汉人的著述里,我们没有获得《诗论》的任何信息。退一步说,这些作者,或者是看到过这部经典,但是无意或无暇去称述或引用,然而至少是那些儒学类与研究《诗经》类著作,恐怕不会是这样的吧!既然存世文献如此,我们只好把目光转移到历来出土的简帛书籍上,再作考索。

## 四、历代出土简帛书籍的规律与推论

历代出土的简帛书籍,其中先秦文献属于一大宗。就已出土的文献,似乎可以得出一些规律,对推论《诗论》的存在与否,具有一定参照价值。我们须对此作一番粗略扫描。

1. 汉景帝末年,鲁恭王毁坏孔子旧宅,在墙壁中发现古文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等。

2. 西晋武帝年间,从战国晚期魏国墓葬中发现的汲冢竹书,有《穆天子传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师春》、《琐语》有部分佚文。

3.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观1号墓出土战国偏早的竹简,有《墨子》佚篇。

4.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与上年代相近的36号墓出土简近千支,有《国语·吴语》《逸周书·大武》《宁武子》等。

5. 1981—1989年底湖北江陵九店发掘东周墓,出土字简156支,有《日书》、烹饪内容,可能为《季子女训》。

6.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1号墓出土约800支竹简,有《老子》《太一生水》《缁衣》《五行》等,另有《语丛》四组,杂抄百家之说。

以上是先秦简帛书籍之出土,以下再看秦汉之

出土:

1. 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 11 号墓出土秦简 1 000 多支,有《编年纪》《语书》《吏道》《日书》,其中最重要的是秦律、《律说》和《封诊式》,均属法律类。这是首次对秦简的发现。

2. 1986 年甘肃天水马滩 1 号秦墓出土《日书》,内容与睡虎地两种《日书》相似。

3. 1993 年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墓出土秦简,有《归藏》《效律》《政事之常》《日书》《灾异占》等。

4. 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 1 号汉武帝初年墓出土竹书,有《吴孙子》《齐孙子》《尉繚子》《晏子》《六韬》等。墓主姓司马,或许与齐地兵家传统有关。

5.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 3 号墓,汉文帝前元十二年(公元前 168 年)入葬,出土帛书简牍,帛书有《周易》《春秋事语》《战国策》《老子》《黄帝书》《式法》《五星占》《天文气象杂占》《相马经》《五十二病方》《导引图》等,竹简木牍系房中书。

6. 1977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 1 号墓,为夏侯婴之子灶葬于文帝前元十五年,出土竹书有《诗经》《周易》《仓颉篇》《庄子》《孔子家语》等。

7. 1983 年湖北江陵张家山 247 号吕后时期墓出土竹简千余支,包括汉律、《奏谏书》《盖庐》《脉书》《引书》《算数书》等。1988 年,同地 336 号墓出土汉律简,另有与 247 号墓内容相同者。还有《庄子·盗跖》等书。

8. 1989 年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竹简千余支,有《日书》《美食方》等。

9. 1959 年甘肃武威磨咀子 6 号墓出土东汉简牍 490 支,主要有《仪礼》9 篇,以及《日书》之类。

10. 1972 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牍,主要是医方。

11. 1973 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,出土竹书《论语》《儒家者言》《文子》《太公》《孔子家语》等。

12. 1993 年江苏东海尹湾 6 号汉墓出土 156 支竹牍,有竹书《神乌赋》、牍书《博局占》<sup>[1]308-310</sup>。

总上先秦至两汉古墓 18 次出土简帛书,有以下特点:一是存世已见经典,如《周易》《论语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缁衣》《孝经》《仪礼》《老子》《国语》《吴孙子》《晏子》《战国策》《仓颉篇》《庄子》《太公》等。二是日常习用书,如多次出土的《日书》、法律书、医书、为官之术的《吏道》或杂抄的《儒家者言》,以及《博局占》、相术、五行等;三是一些被前人视为伪书的,出土文献证明不伪,如《文子》《尉繚子》《孔子家语》还有《庄子·盗跖》等。四是已亡书及逸篇,如《竹书纪年》《墨子》佚篇,《逸周书·大武》《齐孙子》。五是不少无名氏著作与篇章,如《春秋事语》《神乌赋》等。从以上五类可以发现几点规律,首先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重要儒家经典,现已亡佚

者,凡出土简帛书则未发现。其次,《汉志》所载现存先秦典籍,出土者则频频出现。再次,《汉志》所无,而出者有者,均为无名氏所作。复次,除过《诗论》以外,在以上从古迄今的 18 次古书出土中,从来没有发现孔子的任何著作,更没有发现孔子论《诗》的任何残简断编。

总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未见载《孔子诗论》,所以出土的简帛书也没有任何的片言只语,那么《孔子诗论》的突然出现,就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,不能不引起我们重新思考。

## 五、由以往作伪古书引起的思考

对古书作伪史的回顾,或许对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有所帮助。梁启超曾说“无论做哪门学问,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。因为所凭借的材料若属虚伪,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构,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。”他把制造伪书划分了六个时期,特点则分为十个种类,辨伪方法理出六条。今日看来,梁氏所论不一定全为金科玉律,然亦非信口雌黄。如他所说“西汉之初,经秦火后,书颇散亡,汉廷‘广开献书之路’”(《史记·儒林传》语),悬赏格以从事收集。希望得赏的人有时便作讹以献。《汉书》的注“后人依托”者,此类是也。”这是个真伪混杂时代,鱼龙泥沙俱下,经典也好,有名有姓的著作也好,传说中著述也好,依托者也好,都纷纷扬扬地出现了。这是在秦火以后,物极必反,必然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局势。加上汉廷的鼓励悬赏政策,“广开献书之路”,后来又继之以派专人于天下征求,在这种持续极久的热潮中,伪书都粉墨登场,岂有真书还藏而不出、怀璧自重的可能吗?儒学自汉武帝以后,如日中天,谁还有可能怀持秘典珍而不宣呢?换句话说,于此时伪书纷纷出现,攘攘问世,真书又怎能秘而不出呢?

梁启超指出作伪的最后一个时代为明朝中叶以后,“学子渐厌空疏之习,有志复古而未得正路,徒以杂博相尚,于是杨慎、丰坊之流,利用社会心理,造许多远古之书以哗世取名”。<sup>[4]203</sup>丰坊伪造《子贡诗传》《申培诗说》,即以《论语》中孔子有子贡“可与言诗”一语,而作伪。至于申培的《鲁诗》亡于西晋,《汉志》所录的《鲁故》《鲁说》,亦亡佚已久。而《申培诗说》一出,轰动一时,当时成都、南京均为刊刻,纷纷攘攘。接着凌濛初《传诗适冢》、邹忠彻《诗传阐》、姚允恭《传说合参》,信以为真,凭此阐释发挥以释《诗经》,而受蒙欺。是为学术上一大作伪史,亦为一大受骗史。较早的还有伪《古文尚书》。西晋永嘉之乱,典籍文献丧失散亡,石经亦遭破坏。东晋偏居江左,广求经典,豫章内史梅赜献上《古文尚书》,聚集了此前所有称引的《尚书》与数百年古文经师的解说。以后递经明人梅鷟、清人阎若璩、惠栋等著名学者考证,始判定为伪书。因它本身保存有

零散的关于《尚书》的材料,故一直传至今日。上一世纪末,陕西有人传出其祖抄本《孙子兵法》81篇,一时闹得纷纷扬扬,不过为一场蒙眼戏法的笑柄而已。可能大家还记忆犹新,“文革”之70年代初出现的《坎曼尔诗签》,它的来龙去脉,杨廉先生的长文揭示得一清二楚,可当初引发了郭沫若先生的《〈坎曼尔诗签〉试探》,至今存乎其文集;又曾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,以及畅销不衰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也作为扉页插图。进入新世纪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红学,始终保留着半个世纪的热度,于是石碑“曹霁之墓”,也就应运而生。

回看作伪史,伪书总和一时的社会风气,文化思潮息息相关。从作伪者来看,不外乎名利两端。像丰坊还伪作《鲁诗世学》,与以上言及的二伪书相互为表里,诋斥《毛传》,间或有些见解给人以启迪,故至今还留存在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中,然其书经清代学者姚际恒、钱谦益、朱彝尊等考辨,显系伪书无疑。

一代有一代之学术,而一代之学术,无不与所在时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思潮与风气息息相关。自上世纪90年代,我国经济逐渐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,改革开放加大了步伐,社会思潮与人们的思想观念,也随之相应起了巨大的变化。“文革”期间的批孔与批“四旧”,转化为国学热与新儒学的兴起。然而经济大潮的刺激,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,渐至涉

及社会的各个角落,涌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假冒东西,诸如各种证件、文物、书画、药物、食品、饮料、日用百货等,蔓延于社会的各个行业。至于论文、专著、剽窃,每每见诸于报刊与新闻媒体。《孔子诗论》就出现在这时期。而且,《诗论》又没有出土地点和挖掘记录,这就更让人疑惑。这种没来路的竹简,我们必须以慎重的态度对待。另外,《诗论》竹简的书法字形,与郭店竹简写法极为相近,故论者有《诗论》与郭店竹简同出一处。然反过来说,《诗论》字形有可能模仿郭店竹简而来,二者的字形可以作细致的比较,是不难得出结论。限于文章的长短,此处暂且不论,容后再言。

总之,《孔子诗论》本身存在许多矛盾,我们先把困惑处粗略提出来,希望得到不同意见的批评,使问题的真相能得到更为清楚地解决。

#### 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李学勤.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.
- [2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
- [3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3.
- [4] 梁启超.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[M].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.

[责任编辑 许正文]

## A Differentiating Analysis of Confucius' s Poetics

WEI Geng-yuan

(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, Xia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, Xi' an 710065;

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,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, Xi' an 710119 , Shaanxi)

**Abstract:** Since the publication in 2001 , *The Bamboo Slips of Chu in the Period of Warring Kingdom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* , especially *Confucius' s Poetics* in the work ,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and lasting upsurge of investig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, which made it a noted school for some time and caused the appearance of large quantities of research results. However , the work presents several doubtful points that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seriously. First of all , the work differs from *The Analects* and *The Book of Songs* in many ways , such as theory , language , expressions , words and sentence patterns. Next , an instructor of *The Poems of Lu* , *Han and Mao* and the last Confucian master , Xun Zi chose to settle permanently in the kingdom of Chu and wrote Xun Zi in his late years there. However ,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Confucius' s Poetics. After the Incident of Burning Books in the Qin Dynasty , the court of the West Han Dynasty collected extensively the pre-Qin classics , but not a word was mentioned about *The Poetics* in *The Volume of Arts and Literat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* and in the works on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. Moreover , not a lost Confucian work , such as *The Book of Music* , has ever been discovered in the unearthed silk manuscripts and bamboo slips. In fact , those pseudographs in the past were all related to the atmosphere of current society and trends of the time for the purpose of seeking money or fame. Then , *Confucius' s Poetics* offered no place of unearthing and appeared just in the surge of counterfeit , which is worth deep consideration and careful differentiation.

**Key Words:** *Confucius' s Poetics*; *The Analects*; Xun Zi; classics in the West and East Han Dynasties